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书刊评论】	评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	唐少杰
【史海钩沉】	“七·二七”之谜	小 鹰
【史林一叶】	文革版北京工人理论队伍盛衰史	陈徒手
【劫后反思】	“文革”对话录	邵济群
【研究报告】	上海红卫兵运动的异端中申会	李 逊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书刊评论】

评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

• 唐少杰 •

谢静宜新近出版了《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版，以下简称谢书，引用只注明页数）。作为毛泽东身边的机要员，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派往某些单位担任要员，肩负毛泽东指派任务的特殊人物的回忆录，对于人们了解毛泽东晚年，提供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

—

在文革的故乡，出版文革参与者、经历者、见证者的回忆性著作并非易事。最近十多年来，在海外出版的诸多文革著名人物的回忆录，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丰富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推动了对文革的反思。今天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谢书，虽然有特定的取向，也是一件好事，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关注文革，具体了解毛泽东与文革的复杂关系的某些方面。尽管谢书的某些回忆还是孤证，但是由于作者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她是少有的可同毛泽东直接对话的工作人员，在1970年之后成为通天人物。当然，她的回忆也有待于与其他人的相关回忆或文献资料互证。

谢书透露出的新的信息并不是很多。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毛泽东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指派谢静宜接待、安排林立衡进京；二是毛泽东1968年7月下旬向清华大学派遣工宣队。

1971年10月，毛泽东让谢静宜代他问林立衡好，认为林立衡与她家人是有区别的，“何况林豆豆是在她父母逃走之前就向中央报告了，她是有功的”。（第63页）在谢静宜、武健华一起向林本人传达了中共中央有关林彪出逃的文件后，“林豆豆态度是明确

的，笑了笑说：‘他们自绝于人民，罪有应得。’”（第65页）谢静宜的回忆表明她与林立衡相处的这段日子是比较平静、顺利的，这与林立衡后来的回忆大有出入。

谢书披露了有关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的内幕。毛泽东在1968年7月24日上午就决定向大学派出工农群众，因为北京“唯有学校的形势不好。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羞耻”。“他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也脱离了他本派的大多数。”“他们不是谁都不怕吗？我看他们也有一怕，那就是怕群众，怕工人怕农民。”（第176页）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一天，毛泽东批发了中央关于制止全国性武斗的“七二四”布告。毛泽东决定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农民队伍，去清华、北大制止武斗。“至于先去北大还是先去清华，请北京市商量定。哪一个学校问题严重，就先去哪个学校，捅它这个马蜂窝。”（第177页）

谢静宜从毛泽东那里领受任务后，向在北京新华印刷厂的8341部队副团长张荣温、该厂革命委员会主任迟群做了传达，他们向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做了报告。最后，他们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汪东兴的意见，向北京市领导人做了汇报，这些领导人建议，由于清华大学武斗严重，工农宣传队先进清华为好。

据迟群后来在清华的回忆，7月26日下午两点多，毛泽东在其中南海住所，指着铺在地毯上的清华地图，向8341部队有关人员部署进驻任务。同日下午5点多至次日凌晨两点，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有63个单位负责人出席的会议，吴德、迟群负责具体部署进驻清华的方案。

谢书说，毛泽东预计到“会发生流血的”，那时“主席时刻关注清华的消息”。（第179页）这与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中队队长陈长江的相关回忆有所不同。据陈回忆，毛泽东在7月28日凌晨两点多刚入睡不久，周恩来打来电话向毛泽东报告了清华大学发生的流血牺牲，毛泽东深感意外，脱口而出说道：“造反派，真的反了？！”

谢书提供了一个细节：那天进驻清华的数万人除了所带的宣传品外，只带了一天的口粮，并未做在清华长期待下去的打算（第178页）。这表明，1968年7月27日这一天，后来意义上的领导大学的工宣队还没有真正形成。毛泽东一个月后对谢静宜说：“真正在上层建筑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从‘727’开始。”（第181页）

读谢书我形成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开始向清华派出工宣队只是临时性的举措，旨在平息北京高校的武斗。由于清华“团派”对工宣队的抵抗造成的牺牲，工宣队的领导随后成为大学文革的政治机制。其次，到了1968年夏季，毛泽东已不止一次地说过，关于文革的时间，“我说三年就三年”。因此，外地以中央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为指针，北京以工宣队为先锋，结束以造反派为主导的文革群众运动。从毛泽东到北京市领导人，在“七二七事件”前的几天，谁都没有提及在向清华派驻工宣队时有必要事先通知清华两派，对蒯大富及清华两派弃之如敝屣的态度昭然若揭。对于工宣队的殊死抵抗是清华“团派”灭亡的标记，这再次印证了文革中的一句流行话语：“政治斗争就是要引导对方犯错误。”

二

谢书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对毛泽东诸多轶事的回忆。这使我不能不思考历史回忆与历史反思之间的微妙关系。披露毛泽东对文革中一些事件、人物和问题的看法，是谢书的特色。我感到，她对待毛泽东的评价上，除了那种流行于过去的“神化”做法之外，还有流行于今天

的“虚化”做法。“虚化”的具体表现就是把毛泽东置于文革大局之外，仿佛对于文革灾难和众多个人的悲剧，不是他本人穷于应付，无能为力，就是他的理念与文革的实践南辕北辙。“虚化”实际上是为着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有意回避毛泽东的文革错误，回避其中的历史教训，这样，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却变成了不食文革政治烟火的虚假形象！这里仅举几例：1，谢书强调“毛主席反对个人崇拜”（第167页）。基于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与斯诺的谈话，不难看出，如果毛泽东是真正反对而不是切实利用个人崇拜，何以谈得上毛泽东对文革的酝酿、发动、铺排和领导呢？2，当谢书提及毛泽东反对文革一系列的专案扩大化（第189页）时，这种反对意见与文革现实和文革历史的对比是多么的苍白无力。3，当谢书谈及“毛主席对教育战线的评价”（第200页）时，这种评价与文革教育战线的实际状况又有着怎样的不可调和的反差或冲突？4，当谢书论及毛泽东从对田家英、王良恩之死的反应，到对蒋南翔、陆平“解放”的关注，再到对翦伯赞之死的批示，最后到对钱伟长、刘仙洲、冯友兰、梁思成等等的关心，我不禁要问：毛泽东与上述人物的不幸之间有无必然联系？5，谢书说起“毛主席决定清华、北大在江西的农场搬回北京”（第204页）时，回顾这时毛泽东决定办这种农场、由作者等人具体负责，一个原因是轻信了江西共产主义大学负责人所说的这种农场所在的地理位置没有血吸虫病源。谢书未提下放到那里的北大、清华上千计的教职员工患上了血吸虫病，十多人非正常死亡，而只说：“因调查研究不够，造成大错。是一个深刻难忘的教训！”（第206页）人命关天，未免过于轻描淡写！

对于历史的回忆，人们不仅会对事实、取向和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追问和探寻，而且还会对回忆的选择、取舍和作用做出质疑和评说。回忆凸显了什么、淡化了什么和回避了什么，都值得发掘和追问。对文革诸多重要事件，毛泽东有无表态，表态是何内容，人们本希望谢书有所披露。仅举与作者密切相关的例子来说，1973年下半年，在教育领域，从“张铁生交白卷事件”到清华大学的“三个月运动”，从“黄帅事件”“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到这年年底在北京十七所大学给631名教授进行的“考试事件”，毛泽东本人有无反应？谢书中均未涉及。对于1974年初“批走后门”，作者与迟群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公正地讲，“批走后门”并没有什么错误，只不过是牵扯到了包括毛泽东本人“走后门”在内的一些要人的利害关系，而只好作罢。对于作者与迟群如何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急先锋，如何领导“梁效”，如何在1976年3月带领清华、北大十余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面对面批判邓小平等问题，毛泽东有什么样的具体态度，谢书也未着一字。特别是在清华大学刘冰等四人1975年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控告迟群和作者，除了公布的毛泽东的那一批示外，还有无具体的谈论或举措，谢书也不置一词。当然，我不能苛求作者讲清一切重大事件，有些事情可能确实没有惊动毛泽东本人。我只是想从与作者经历相关的线索中，看到更完整的晚年毛泽东。显然，作者对于毛泽东晚年众多轶事或言谈的知悉，远远多于本书所公布的点点滴滴。或许不是作者不想讲，而是今天的言说环境和出版条件，造成了这些缺失，使得谢书对于毛泽东的“琐忆”，欠丰满，欠充实。

三

谢书在写作和编辑上也有诸多不足，二十万字的书内容多处重复，例如，不止一次提及毛泽东转给作者一百多本连环画，以便帮助她学习。此外还有一些史实方面的纰漏。如把当时天津市长万晓塘的名字误写为“万笑堂”（谢书图片集第二幅照片和第103页同一照片的解说）。又如，把武健华的名字误写成吴建华（第64、65页）。提及毛泽东向清华大学工宣队转送芒果时，错把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阿沙德·侯赛因赠送芒果说成是后来巴国总统叶海亚赠送的（第181页）。谈及1968年北京市领导人谢富治、吴德等等时，把他们说成北京市委的领导人（第177～178页等多处），其实1968年没有中共北京市委，1967年初至1969年初全国的党组织陷于停顿。又如，“1970年

的一天，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第193页），其实这一年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是谢富治。谢书把清华大学的第二教学楼当成当时清华“团派”的指挥部所在地（第178页），实为清华静斋。谢书提及1968年8月15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工宣队代表时，说这些代表“坐满全场”（第181页）。其实，这是毛泽东在1967年至1968年多次例行的大规模接见解放军各大单位副团职以上（近十万人次）干部的活动中的一次插入安排，当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报道这一活动时，凸显了毛泽东接见上述代表，而实际上被接见者还是以军队干部为主。谢书提及蒋南翔1973年被“解放”，“蒋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在各系派一些代表参加的会上检讨后，学校宣布给予解放”。给蒋发了出席1973年十一节游园活动的请柬（第223页）。实际蒋被“解放”的时间是1974年9月29日。谢书图片集第11幅照片与第58页上的照片实为同一张，但却有两种不同的解说词。

如果说，年届八旬的作者记忆有误可以谅解，那么编辑的审稿就显得十分重要。然而，随着对文革的长期淡化和虚化，今后中国的传媒领域能否拥有具备足够的文革知识的专业编辑人员，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

~~~~~

【史海钩沉】

## “七·二七”之谜

· 小 鹰 ·

1968年7月27日上午，在毛泽东亲自部署之下，北京地区几万工人，手持毛语录突然开进清华园，去制止那里两个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持续了百日的武斗。然而，手无寸铁的工宣队却受到了蒯大富团派的武力抵抗，结果死五人，伤731人。这样的惨剧为什么竟会发生在毛泽东支持的工人和红卫兵之间？它难道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吗？文革三大学生领袖蒯、韩、聂在回忆中，对此“七·二七”之谜均有较多的议论。例如：

蒯大富口述《岁月流沙》时抱怨道：“我后来几次批评当时的组织者，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们打招呼啊？那次实际上是杨德中指挥的，吴德、谢富治他们都应该知道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也写道：“但我始终困惑的是，为什么不直接先跟蒯大富说一声呢？他不仅是清华学生组织的头头，他还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我还是副主任呢，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这件事的确是个谜。

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里曾探讨了“事先不通知的原因”。他主要是指责迟群、谢静宜等人“办事水平不高”，“以为尚方宝剑在手，自以为能”，或归结于谢富治“文化水准不高”，“他也不方便通知蒯大富”，等等。

然而，笔者注意到，在7/28凌晨毛召见之后，谢富治立即要求五位学生领袖“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以便向下传达，当时，他特别交代了一句：“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对外先不讲”。“对外先不讲”——这究竟是谢的意思，

还是毛自己的指示？笔者以为，如果不是毛自己有此令在先，谢富治恐怕是不敢这样“越俎代庖”、“画蛇添足”的。韩在书中写道：“谢富治说过，开一万人的会都要请示毛主席”。召见时毛自己也讲，“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谢深知主子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尽管在召见之后，“对外先不讲”的时效已过，但没有毛的再指示，他又哪里敢轻易违背？——要知道，那是个令所有官员“恐惧战兢”的年代啊，对于“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再有，在决定派出工宣队时，毛不是只说一句话，就让下边去办事的人。相反，“毛泽东亲自听取了准备工作汇报，毛泽东蹲在地上，俯视清华平面图，他用大手在图上指示工人从南门、西门、东门分别开进清华”。这些事实表明，毛定此事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亲自做了周密的部署。“事先不打招呼”，这不大可能只是一个疏忽或“没有想到”团派会开枪抵抗的结果。

7 / 27 事发当天，蒯大富是见到过吴德、迟群和谢静宜的，迟、谢二人肯定知道是毛派出的“工宣队”。即使事先来不及“打招呼”，当已发生严重的流血死人事件时，迟、谢为何仍然“秘而不宣”这“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还在同蒯大富没完没了地“谈判”？这里的隐情恐怕是领袖另有“对外先不讲”的口谕。

蒯大富后来“分析”，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没有说出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认为那是别人故意对他“封锁消息”。韩爱晶则对蒯大富讲：“人家就是幸灾乐祸，看你的笑话，盼你倒霉。”

然而，笔者以为，众人“不约而同”地“封锁消息”，恰好表明：派工宣队进校一事，根本是毛有意不让预先通知，他一定要等事后由自己来讲这件事。这或许是个更合逻辑和情理的解释。

韩爱晶批评“毛主席布置方法不规范。应通过周总理中央碰头会，再由谢富治、吴德、黄作珍及李钟奇在市革命委员会布置几万工人进清华”。但是，毛正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历来喜欢搞“奇袭”。他知道，那样一来，将很难保密，结果就难奏奇效。

有的同学认为，“毛泽东对蒯大富等人说：‘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什么叫‘间接打了招呼’？应当是通过一个中间人打招呼。这个中间人是谁？我猜想周恩来的可能性较大。”事实上，毛在此事上最不想通过的人，大概就是同情414的周恩来。因此毛绕过中央，直接指示可靠的“身边人”动作，搞突然袭击。但结果却“出乎意料”，令毛扼腕叹息——不是因为死伤了工人，而是他不争气的宠儿掉入了陷阱。毛泽东恨恨地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在这个时候，414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414欢迎工人。”毛“咬牙切齿”地放的这些狠话，使人不禁恐怖地猜想，假如打死工人的是414，那他会就这样轻易地放过么？恐怕一些知识分子又要面临新一轮血腥清洗，历史将会大大地改写了。

近年来，蒯大富仍为自己辩解说：“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

是这样吗？

中央多次发布“制止武斗”的告示，谢富治、吴德也做了告诫，都可以说是“间接打了招呼”。而那时团派却强调：“七·三”布告不适用于清华，团派与四派的武斗有特殊性。

即便7 / 27那天迟、谢二人奉旨宣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蒯大富就肯附首接旨吗？未必！在毛“大权独揽”的年代，在毛之文革宠儿们看来，中央算什么？谢富治、吴德又是老几？更何况是“名不见经传”的迟群、谢静宜了。没有毛亲自发话，谁又能不怀疑这“间接的招呼”不是“黑手”在背后操纵呢？文革中“无政府主义”泛滥，“怀疑一切”、“打到一切”之风盛行，正是毛自己专权独裁种下的苦果。

后果呢？“惨剧发生在毛泽东支持的工人和红卫兵之间”，这令韩爱晶难以理解。殊不知，这惨剧恰恰是毛所期待的拿住红卫兵小将们的代价，唯有至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才最有震撼的威力。毛在召见时说，“我说这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实际损失最小、最小。”林彪立即响应道：“值得，损失最小”。周恩来接过话茬，重复林对文化革命的总体评价，巧妙地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这是奉承还是“语义双关”的讽刺？不得而知，反正毛挑不出他的毛病来。和往常一样，毛泽东则用他自己的“检讨”惯用语，轻松地调侃道：“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一句空话，完了。

改写于2014年9月

附记：谢静宜的回忆

《作家文摘》2015年1月13日第一版，摘录了“七·二七”事件核心人物谢静宜的回忆，她披露了当年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过程和重要的细节如下：

谢静宜在回忆录中披露毛制止清华大学武斗，7月24日毛找谢静宜布置，决定派两三万工人去宣传，至于先去清华还是北大，请北京市商量定。并说：“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谢领受任务向张荣温、迟群传达，回部队向杨德中汇报，又一起向汪东兴汇报，之后找北京市领导，决定先进清华，7月27日进入清华，遭到武力对付。市委和8341部队同去清华的简报组，不断将情况汇报给毛和市委领导。毛时刻关注着清华的消息，他得知真情后，于27日深夜 / 28日凌晨，召见了当时的五大领袖，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打掉了五大领袖的气焰。8月5日，毛把巴基斯坦叶海亚送给他的芒果，让汪东兴转送给工农宣传队的同志们吃。8月15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工宣队的代表。从此，清华大学形势好转。”（摘自谢静宜著《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谢静宜的回忆是可信的，它戳穿了毛假装糊涂的演技，或“不知情”的说法。派几万人去清华是毛泽东背着中央，自行下的一笔大赌注，是他亲自指挥文革换马的重大战略行动。在打这么重要的一仗时，毛会去睡大觉？或对战况浑然不知？他不是告诫说：“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吗？看来毛是预计会流血，也“时刻关注着清华的消息”，并被“不断的汇报”及时告知了流血、死人事件，而这一切正是他所策划的、所期待的结果。待毛泽东拿住了确凿的把柄，然后才召见五位学生领袖“问罪”，让他们及所有知识分子“无言可对”、不得不俯首臣服他“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英明决定”。

谢静宜的回忆支持和补充了笔者在《七·二七之谜》里的推测。

2015年1月21日又及

~~~~~  
【史林一叶】

文革版北京工人理论队伍盛衰史

• 陈徒手 •

◇ 狂热的政治学习潮

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共党内开展了一连串政治批判兼具理论学习的运动，试图逐步消除林彪集团的负面影响，掌握理论宣传、权威辩诬的制高点。1973年10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国庆社论《认真学习，继续前进》，传递出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就是要办好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工作”。这里就初步蕴含着全民理论学习的模式，确定今后不脱产的特征。

1974年4、5月间，中共中央发出“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相关通知，明确指出，“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党作极大的努力。”全国各地随之召开了群众“批林批孔”大会，动员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力量，主讲人多是工农兵及机关工作人员。

1975年1月29日张春桥、姚文元报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共20条，长达五千字，毛泽东很快于2月2日批复同意印发。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33条，其中列宁占了23条，由此正式拉开了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帷幕。

北京工人理论队伍最早兴起于1972年的批林整风，成形于1973年的“批林批孔”，火爆于1974、1975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据1975年7月26日北京市委宣传组报告，目前全市工农理论队伍已发展到25万人，其中工人理论队伍16万人。市委宣传组黄森在同年8月8日还宣称，“现在全市工人业余学校已发展到5600多所，有68万多人参加，农民五七政治学校已在绝大多数生产队中建立起来。青年业余学习小组十万个，近百万人参加。”（见黄森《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针进一步巩固提高工农理论队伍》）

到了1976年1月，市委宣传组统计表明，全市先后办起了10958所业余学校，有241.3万多人参加学习（其中工人业余学校6833所，学员79.5万多人）。此外，还有十万个青年业余学马列小组，经常有百万人参加学习。（见1976年1月19日《北京市几年来有关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发展成长的若干资料》）全市竟有240多万人参加政治学习，大规模地卷入了理论热潮，很快达到文革期间当局所能预期的人力规模极限。

◇ 小厂能作大文章

1975年8月8日，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丁某在市工农理论队伍工作座谈会上表示：“工农群众直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积极参加理论战线的斗争，这是历史的一个创举，是上层建筑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他还指出，这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实现党的基本纲领和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战略措施。

使用“历史创举”“战略措施”这种政治用语，实际上是中央文件中的框架精神要点，地方党委只是在腔调上不断予以拔高。丁某在讲话中谈到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也间接反映出理论本身的难度和理解上的周折：

过去，不少人对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缺乏全面完整的了解，认识上有片面性。经过这段学习有提高，初步弄清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特征，认识到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辩证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认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存在着前进到共产主义或倒退到资本主义这样两种可能性。

认识到我们现在还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既要承认它的不可避免性加以利用它，又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能一讲“限制”就想马上取消它，也不可一讲“不可避免”又不对它加以限制。（见讲话提纲）

丁某的讲话文本是市委秀才们起草的，这是70年代党内最为时兴、日渐圆熟的理论腔调，张春桥、姚文元尤其擅长此类写作，语气空泛而生硬，来回名词“拉锯”，只是满足官方的一时急需，缺乏扎实的学理。影响所及，北京工人理论队伍所写的文章也大都呈现此类空洞文风，由于涉及艰深问题，理解不便，行文更为晦涩、突兀，论及历史性、理论性较强的话题更要装腔作势，摆出“非我莫赢、你错我纠”的斗争姿态。

北京汽车修理公司五厂是一个只有职工829人的小厂，1973年4月就建立起117人的理论队伍，组建了13个研究小组，其中党史组准备用一年时间，立志写一本大部头的中共党史。厂党委王副书记在1975年8月6日市理论工作座谈会上，极为高调地表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要实现这样广泛深刻的革命，只靠研究机关和少数专业人员是不行的，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我们要想全局，有远见。不怕厂子小，就怕志气短。”

“小厂写大文章”，市委宣传组向市委的报告中屡屡提及汽修五厂的成果。据统计，该厂在几个月时间内，已写了四十多篇专题研究材料，譬如政治经济学小组《正确处理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问题》、历史小组《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所进行的斗争》、哲学小组《领导班子执行什么路线是决定企业性质的根本问题》、中共党史小组《从解放后四次路线斗争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国际形势小组《苏修是怎样复辟资本主义的》等等。

现在再翻阅这些“很受职工欢迎”的文章，味同嚼蜡，价值全无，只是朦胧地视为当年曾经红火过的荒唐无趣的岁月物证，看出那个时代社会语言环境的单调和硬梆梆的特性。对于一般工人而言，像“资产阶级法权”“商品生产”之类均是一个个拗口费解的理论难题，本无深意，却硬要从中寻摸出“正确性”。

◇ 从马恩原著寻章摘句

《人民日报》公布的33条有关无产阶级专政语录，成了1975年各工厂理论队伍竞相追逐的攻坚目标，每一条语录都要花费巨大的人力梳理，铺张扬厉，蔚为大观。

市电表厂工人理论小组光是编写第17条语录的学习辅导材料，就三上三下地来回折腾。这条语录本身就夹杂着一些难句，如“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等，一开始理论小组为了这几条名词解释就弄得焦头烂额，到班组征求意见，工人师傅就说：光解释几个名词，怎么能讲清一条语录的中心思想？有的师傅问：“我们天天跟货币打交道，它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第二次理论小组反复攻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九章，参考了关于商品与货币的学习材料，搞清了商品、货币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瓦解原始公有制的过程。以这个内容向群众宣讲后，众人反映说，对商品、货币的发展史是清楚了，但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起什么作用，还不清楚。

第三次，只得仔细研究这条语录的上下文，学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弄清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及其弊病。该理论小组组长陈某在市座谈会上详细介绍这些琐碎的过程，一再对这些语录几层含义的深广、精神实质和现实意义的宏大感叹万分。

新华印刷厂活版车间理论小组也领取了商品、货币的专题，崔姓组长在市座谈会上讲述了攻关的难度：一开始试着从一本几十万字的货币史和几本丛书中摘出观点，发现观点比较含糊，只讲物不讲人，不讲压迫与剥削的关系，看了半天，也不清楚商品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他们坚持读马列原著，反复琢磨之后认为，商品和货币不是历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它们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见会议记录原稿）

他们又从商品交换入手，从十几本马列原著中摘出只言片语，构织成一条所谓的私有制发展与瓦解的“思索链条”。从今天的学理去判断，当年施加给各个理论小组的智力活动大多不符研讨常规，脱离社会常情，从狭隘、片面的角度去自圆其说，只是单纯迎合了僵化的政策需求。

◇ 日益强势的理论队

70年代前期，北京市有文科专业的高校七所，文科教师2100多人，其余理工科院校有政治教师三百多人，再加上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and 出版单位专业理论工作者二千多人，这都是北京工人理论队伍所要倚靠的外部人力资源。同时，高校也有“走出去”的政治任务，迫切希望与工厂建立挂钩关系。

从快速出成绩的考虑，各高校都愿意同大厂、重点厂、离市区近的厂建立联系，主要集中在机械、仪表、钢铁、汽车等行业。北京汽车制造厂已有14个挂钩单位，第一机床厂在一个月内就接待17个高校要求挂钩。这些大厂不好推却，只能要求市里统一安排。反过来，有的学校一个热门系就和五十多个工厂发生过挂钩关系。

从一些高校上报的材料看，不少教师的理论水平并不为工人理论组成员所看重，时常挑剔出诸多毛病。北大哲学系总支李副书记1975年8月在市里一次座谈会上承认：“在今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拿到工农群众中去一讲，往往就讲错了，许多工农同志提出了意见，纠正了我们的错误。”有的教师满以为自己读了多少年马列主义的原著，担心工人理论队伍水平低，写不出高标准材料，就预先拟了一个提纲，从内容到形式都做了详细规定，然后交给工人照着框框去填写。结果工人师傅认为此举是轻视的行为，严厉批评说：“你们所定的条条框框，就像一堵无形的墙把我们两支队伍隔开了。”

日益强势的工人理论队伍得到官方的支持鼓励，多方表彰，俨然已是主力军的姿态。1974年秋季推广大连红旗造船厂的经验，组织了理论分科研究小组，北京全市一时间高达2400多个，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国际形势、文艺创评等五个学科，标志着当局有着更高的期许目标，彰显工人理论队伍正向学术全面进军的姿态。此阶段，已有个别工人理论辅导员被分派去高等院校和上级机关参加教课和写书，长期回不了工厂。

北京市树起几面标杆性的旗帜，其中北京汽车制造厂以马凤鸣为代表的历史研究小组，写出《读封建论》、《盐铁论选评》、《水浒选评》、《论刘邦》等书稿，共计25万字，他们的著书经验马上在全市推广。以老工人金清凯为代表的新华印刷厂国际研究小组，研究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苏修的政治经济危机，编写了两本小册子，在报纸上连载，并在厂内外辅导三十多次，听众近十万人，着力显现了工农研究国际形势的最新水准。

◇ 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过后总会有一批积极分子受到重用，譬如市级读毛著先进人物升任市总工会副主任、市公用局工会副主任等职。市机械局共有570多位工人理论小组成员被提拔班组长或工段、车间干部，有的担任厂的领导工作，有4020余名被评为先进职工。在全市范围内，大多数小组成员则是被厂宣传部门、工会、共青团、车间党支部“多头”抓，经常抽去搞突击任务，成为企业政治工作所要仰仗的中坚力量。

工人理论队伍也多少介入了所在单位的人事纠纷，成为权谋斗争的有用工具。譬如市电表厂一位厂长爱办私事，为了把他两个分配在东北建设兵团的女儿弄回北京和安排他弟弟的工作，广拉关系，先后指派19名干部和工人外出活动，给有关单位非法调拨和套购了价值四万四千多元的车床等设备。

据1975年5月统计，全市94个区、县、局级单位大换血，共配备青年干部159人，其中担任副书记33人，副主任77人。京棉三厂工人一位辅导员被破格提拔为西城区委副书记，在区委内部“旗帜鲜明地对某些同志的错误展开原则斗争”，“揭开基层老大难单位阶级斗争的盖子”（市委报告语）。市委领导对这种“迎着风险敢挑重担”的工人行事风格予以赞赏，认为这股新鲜血液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战斗指挥部的作用。

工人理论小组发展到鼎盛之时，其张扬无比的渗透力在各单位起着不凡的作用，无处不闪现理论的“威力”。譬如市百货大楼工人小组学习了商品二重性理论之后，同职工一起研究改进服务工作，扩大商品拆整卖零，方便顾客，尽量发挥商品的使用价值。有些售货员懂得了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以后，带头把代亲戚朋友购买紧张商品的钱退了回去。理论骨干同食品糖果组售货员一起分析，认为卖给熟人杂拌糖时挑挑拣拣，实际上是装进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坏思想。

毛泽东去世之后，政治格局演变剧烈，工人理论队伍起初还承担了批判“四人帮”的任务，但难违时势，不可避免地整体走向衰败，渐次瓦解，到了80年代初，在社会上彻底地失去发言权。让几十万工人参与国家主体话题的研讨，卷入到党内复杂政治生态的诸多方面，这种景象再也无法复现。

□ 原载《凤凰周刊》2015—05—15

~~~~~

#### 【劫后反思】

#### “文革”对话录

• 邵济群 •

甲：现在贪官污吏盛行，人人痛恨，而一些年轻人往往以为“文化大革命”是“反官僚”、“反贪腐”，毛主席给了人民“大民主”的权力，因此是件好事，故也怀念毛时代。那么，文革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乙：是啊，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文革结束快五十年了，至今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不仅是年轻人那样想，一些亲历文革的“造反派”现在反思时，习惯性地又回到文革初期的状态和思维，仍然以为毛是人民盼望的正义和高尚的“大救星”，是英明的领袖带领百姓反“昏官”、“庸官”。例如，有人认为，“毛泽东要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党的阴暗面，企图以此保持党的纯洁性，他需要造反派实现这个目标。”

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1964年12月12日，毛在八机部长陈正人的《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上做了批示。请注意，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说法，说“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样替工人说话，真让人“热血沸腾”啊！

乙：从表面来看，文革似乎是解决“官民矛盾”的运动，它也的确冲击了大部分干部，“造反派”可以起来“批斗”官员，公开揭发他们的“罪恶”。但这种逻辑有两点说不通的地方。

甲：那是什么呢？

乙：第一，“官僚”是个含糊的概念。人们通常是在作风和道德的层面上来理解，即指脱离群众、无所事事，以至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官员。然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只有刘少奇那一派的干部是“官僚”，要“火烧”和打倒，而毛派，包括他自己和“四人帮”等，则都不是“官僚”。这就说不通。

如果要谈论“官僚”，毛泽东本人难道不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官僚”吗？只要看看他建国之后的所作所为，便不难知道，心高气傲的他有哪一项主张不是严重脱离我国实际的空想和妄想？其中著名的“反右派”、“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倾”，致使全国饿死几千万人，真可以说是败笔连连，劣迹斑斑，他却一意孤行，拒不认错！而他所扶持的林彪集团、“四人帮”一伙，康生、陈伯达等人难道就是“公仆”，而不是可憎的、无视人民的“官僚”？1976年的清明时节百姓不是表现得更憎恨他们吗？

所谓“造反派”一语，也很含糊。同样，只有跟着毛去倒刘的算是“造反派”，而那些反毛和林彪、反“四人帮”的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丁祖晓、王容芬等就都绝对是“反革命”！

甲：你是说，这貌似正义公平的“反官僚”现象之下，有一条暗藏的界限？

乙：是的，那就是划分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界限，即所谓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这其实并不是“暗藏的”界限，毛泽东从文革一开始，在“五·一六”通知里就讲明了这一点，只是许多人只看表面，至今还是“隔靴搔痒”地谈论“官僚阶级”或“特权阶层”。

此外，如果说文革只是毛泽东要治官、要搞平衡，或只是官僚之间的内斗，那怎样解释文革运动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怎样解释，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运动重点批斗的还有各种“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

这是“反官僚”一说的另一个说不通的地方。

甲：有人这样来解释，即认为那些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也是附着在“官僚主义者阶级”上的“特权阶层”，所以也要批斗。

乙：这种推广把党内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如吴晗、杨献珍，以至老舍、周谷城等“学术权威”，都纳入了“特权阶层”，成为人们仇恨的对象，这是想给毛泽东发动疯狂的文革找一个“正当”，甚至“正义”的理由吗？

甲：我也觉得那样讲很“牵强附会”，因为那又怎样解释，文革中，除了少数御用文痞和秀才之外，几乎所有专家、教授、作家、演员、中小学教师、普通的文化工作者，一般干部，甚至一切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整治？中小学教师、校长又算是什么“学术权威”和“特权阶层”？为什么毛泽东也不放过这些人？

乙：所以，这里还是路线斗争，是政治权力的斗争。关键在于，毛泽东认为，“解放后在文化教育领域内，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这些大帽子一压下来，中小学教师，甚至一切知识分子还逃得掉吗？

甲：不过，话说回来，国家本身“是官僚主义的温床”，时间一长，总会滋生贪官污吏，这也是事实。

乙：不错，共产党内的腐败历来就有，早年有顾顺章、向忠发，后来有刘青山、张子善等代表人物。解放后，干部收入高些，也的确有特殊的待遇，包括困难时期的“糖豆干部”、“肉蛋干部”等（指困难时期17级和13级以上的干部有些额外的糖豆和肉蛋的供应）。但总体上，那时干部与普通工农的差异，并不到《九评》所说的苏联官僚们“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那样严重的地步。那时官场上的营私舞弊，贪污腐化，也远不及今日那么普遍、猖狂。总体而言，政府还算清廉，官员也尚俭朴。就高级干部来说，待遇和特权彼此大致相同，毛和刘二人之间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不能因此便说，刘少奇及其一伙就是“官僚阶级”或“特权阶层”，而毛泽东的一派便不是。所以毛并不能以“官僚主义者阶级”构成打倒刘少奇的口实，更不用说有“海瑞”口碑的彭德怀了。

甲：那毛为什么要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一说法呢？

乙：我想，毛泽东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批示，用意只是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妖魔化，更多具有激发众怒、煽情造势的意义。然而，令他感到不妙的是，这种说法因为阵线不清，它可能又有“引火烧身”之弊，也就是我们上面说的第一个不通之处。他恐怕人们会问：“你毛泽东的政策饿死了几千万人，就不是吃人的‘官僚’了？”所以，后来就不再见他有这一提法，而是直接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恶谥来兴师问罪，以路线和司令部来作为划分干部好坏的界线。现在一些人抓住毛在64年的一个批示，大作文章，实际上是落后了一个位相。

甲：记得是陈伯达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语太绕嘴，就给简化为“走资派”了。那么，究竟什么又是“走资派”呢？

乙：这个“帽子”果然厉害！它可大可小，大的可以戴给刘少奇，小号的可以戴给中学校长。毛自己的准则就是，只要是不合他的“社会主义道路”模式的，或他不喜欢的人，统统可以戴上此帽子，予以打倒。这样一来，连清官“海瑞”也逃不掉了。

甲：有没有中号的帽子？

乙：大多数就是中号的。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为例，一位国务院的部长，可以算是个“当权派”了。1965年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党内是否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问毛：“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随口就点了煤炭部长的名：“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于是文革一开始，中央文革小组的爪牙戚本禹拿了这句“金口玉言”到北京矿业学院去煽风点火，正在“大庆”蹲点的张霖之就成了煤炭工业系统的头号“走资派”，立刻被“造反派”揪回北京，连续打斗一个多月，1967年1月22日凌晨，被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打死在校园里。

甲：张霖之属于钦定的“走资派”，应当算是个“典型”了，但他到底有过什么“走资派”的“劣迹”？为什么是个“十恶不赦”的贪腐“官僚”？

乙：至今无人知晓！给他定罪凭的只是毛泽东当年讲过的那一句话。

甲：那为什么毛泽东这么恨张霖之？

乙：其实，毛对张霖之的“业绩”或“恶行”有多少了解，或张是否与毛有什么“过节”，这并无关系。毛泽东那是跟刘少奇过不去，张霖之就成了其斗嘴的牺牲。不难想象，假如刘少奇问的是：“冶金部、煤炭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恐怕会说“怎么没有？吕东（时任冶金部长）就是！”

甲：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刘少奇说他不是“走资派”，那他一定就是了。

乙：正是这样，此乃“两个司令部斗争”之谓也。毛这般定罪法，是不是个专制的“官僚”？这和斯大林动辄指人为“人民的敌人”，便予以枪毙，又有何区别？

所以，文革的本质决不简单地是个“官僚”和“造反”的问题，也不是“四清”和“四不清”的问题，而的确是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也就是政治权力之争。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自己是十分清楚的，包括清理阶级队伍，抓“叛徒”，也只是抓刘系的“叛徒”，而绝不触动“自己人”，如张春桥、江青。

甲：我明白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简单地说，本意是要打倒“走资派”。而毛说的“走资派”并不等同“官僚集团”，这是两个概念。可是，“官民矛盾”的确是群众能发动起来的重要原因，是不是？

乙：要说官民矛盾，我觉得在文化落后、贫困的农村里也许更能直接感受得到。有些基层干部们多吃多占，滥用职权，甚至像恶霸似的。但在农村中，这些出身好、根子正的“土皇帝”反倒是难以撼动，四清、社教和文化革命都奈何不了他们什么，在基层还是他们说了算。相反，那时在城市里，特别是出自高层的官民矛盾似乎并不那么明显。文革前我们对“彭罗陆杨”又知道多少？历次政治运动，例如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等等，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和社会矛盾，相对六亿人口而言，也毕竟还是少数。那时没有那么多上访的人群，政府也没有那么庞大的“武警队伍”和“维稳费用”。

而我们具体可见到的高教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当时还是被多数师生认可和拥护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要“为社会主义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校园内也还算和谐，那时教学和科研都欣欣向荣，学生老师各得其所，并无什么严重的矛盾冲突。“劳逸结合”、“女生食堂”等措施，还被当作是“党的关怀”而感激。所谓的“修正主义”是很抽象的东西，不知当年你在校时的感觉如何？

甲：我是1962年秋入学的，那会儿我国刚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反右倾”造成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1962年初在“广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讲了话，要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纠正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极左”政策。一时间文化界、科教界人心舒畅，工作积极性陡涨。我们这一届，恐怕也只有这一届，高考录取的所谓“政治条件”降低了，许多成绩优秀而“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可以被录取到“保密专业”学习，大学中的政治气氛也一度变得宽松起来。

乙：是啊，那时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都很活跃，校园里周末有舞会、音乐会，也放过一些后来被认为是“毒草”的电影，像《五朵金花》、《林家铺子》、《革命家庭》、《早春二月》、《怒潮》、《红日》、《洪湖赤卫队》、《柳堡的故事》，其实都很受同学欢迎。后来大学里也放映些香港和西欧影片，看得人就更多了。那时的香港电影没有什么警匪打斗片、武侠动作片，多是反映社会普通阶层的生活故事，像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一类，国外的影片有《偷自行车的人》、《警察与小偷》、《三剑客》、《伪金币》等，很有些艺术性和“人情味”。总之，校园生活相当丰富多采。

甲：可是后来这些都被当作“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化”来批判了。

乙：其实，那时学校当局还是努力按毛的指示进行教育改革，例如，精简课程，缩短学制，也常组织师生下乡下厂劳动，访贫问苦，接受军训，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生中来自贫下中农家庭的也很多，贫农家庭出身的蒯大富63年不也入读了清华吗？那时上大学不但不用交学费，贫困学生还有“助学金”保证吃饭和生活零用。不知为什么毛泽东说教育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我们年级有位Z姓同学，来自四川农村，有一冷天在校园里光脚走路，被蒋南翔校长看到，便关心地问他有什么困难？并特意指示行政部门帮他买了双鞋穿。文革时此事也被拿来批判，说蒋南翔以“有碍观瞻”为名歧视工农子弟。

甲：反正只要不如他“毛婆婆”的意，就说你是“修正主义”、“走资派”。

乙：如果说刘少奇、蒋南翔在清华搞的是“资本主义”，那我看，这样的“资本主义”大学，比文革中由“工农兵”上、管、改的“社会主义”大学要强百倍，比现在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化”大学更是要好很多。你说呢？

甲：就是嘛！要是解放后没有毛路线的“主导”，没完没了地搞什么“教育改革”、“阶级斗争”、以至“文化大革命”，那清华早就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了！

乙：说起“文化大革命”，有人认为“官民矛盾是‘第一重紧张关系’，它的确是群众能发动起来的重要原因。”但文革开始时，我们系低班Y同学把一桶墨汁倒到系领导的头上，他真是因为有什么苦大仇深的“阶级仇恨”而要起来造反吗？我很难理解。打死张霖之的“造反派”，打死校长的“红卫兵”，对他们批斗对象的“罪行”有多少了解？又有些什么“不共戴天”的“第一重紧张关系”或“官民矛盾”，非如此处置不可？我想，多半还是因为受

到毛泽东的蛊惑、恫吓和煽动，出于对毛狂热的崇拜和盲从，以及对“修正主义”抽象的恐惧和仇恨，把他们想象成了“十恶不赦”的“魔鬼”，更说得通些吧。

甲：也不排除有些人是为私利，出于好胜、表现、嫉妒、争宠、献媚等不善之心，甚至是虐待狂，这是人性“恶”的一面。然而，在那个年代，他们却以“革命造反”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出现。

乙：是的，不过这里还有个社会心理学的问题。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教授1971年所作的斯坦福模拟监狱实验表明，在一种权力突然膨胀并失控的条件下，即使是平时心理健全的好人也会主动做出许多邪恶的事来；或在极度专制的环境中，你以为自己只是去执行“伟大领袖”的命令而不用担负任何责任，你就会违背良心，允许你自己做一些你以为你从来不会做的事情。所以说，创造了这类环境和体制的人更是罪魁祸首。

女附中的学生你一拳、我一脚打死校长，便是一个例子。年轻的女孩更容易冲动失去理性，且相互攀比，下手更狠，当然，更多的人是跟着去助阵，呼呼口号，打打“太平拳”。在这一点上看，追究凶手是没有意义的。那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连校长老师都成了“黑帮”，毛还煽动“要武嘛！”这是什么“革命”？！这种“环境”的造成，主要是毛泽东的责任。正如上世纪卅年代法西斯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是希特勒反犹太政策的结果。

甲：说起希特勒的反犹太政策，我感到，长期以来国人被引导对“右派”、“地富”等黑五类及其后代的歧视和虐待，也有类似之处。社会上流行以所谓“出身成分”或“政治表现”来划分人群的优劣贵贱等级，并煽动“社群”之间的仇恨和斗争。这种变相的、丑恶的现代“种姓制度”加上祖传的“株连九族法”，使许多“社会贱民”及其后代长期生活在受歧视的阴影和迫害之下，完全不顾人的平等、尊严、价值和才能。

乙：这正是毛泽东为治国而实行的对民众分化打拉手段，即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断树立各种“斗争对象”，同时，又给众多追随者以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幸运感、安全感，进而树立对他的畏惧感、愚忠感。这是专制统治所必须的“党文化”和“奴才文化”。

甲：看来，文革中所谓的“群众发动起来了”，也是制造仇恨的专制制度使然为主，人性软弱、心理缺陷使然为次，并非是因为什么“官民矛盾”或“第一重紧张关系”所致。

乙：最近陈小鲁、宋彬彬公开道歉一事又引起争议，但似乎无人关心或询问文革中涉及其它文武暴力事件的“造反派”是否应当道歉一事。虐待打死张霖之的人在哪里？那些紧跟毛泽东和“四人帮”搞“大批判”，“摇唇鼓舌”、以笔杀人的“文暴”秀才们又在哪里？有没有道歉过？不错，蒯、韩、聂等为自己文革中的罪行被判刑坐过牢，但刑事责任和惩罚是一回事，内心的忏悔和道歉又是一回事，二者并不等同。他们的灵魂里有过后者吗？大概没有，相反，韩爱晶还在大谈毛的“人民性”，蒯大富自认在法庭上的自辩是有力的，他也是打毛这张牌。不彻底否定毛泽东，这张牌就有人还要继续打下去的。

甲：我想，大多数“造反派”是受了蒙蔽，文革中跟了反动的路线和反动的领袖去为反动历史而斗争，可以说是“集体失智”。但我并不赞成因为要否定毛泽东，就要惩罚文革中追随过他的大多数“红卫兵”和“造反派”，这也是毛的封建主义的一种遗毒表现。

乙：我赞同你说的。虽然对多数人而言，不应去追究个人的责任，但这毕竟不是光荣的历史，而是沉痛的教训。记得看过历史资料片，当年德国民众狂热拥戴希特勒的光景，和文革

时一模一样。这是不是群众被政治家玩弄的“羊群效应”？法西斯德国迫害犹太人，还是以官方为主的行为，而民众参与的“水晶之夜”也只持续很短的时间，哪里有像“文革”时的群众和官员互整，群众和群众互斗，迫害与被迫害涉及范围之广？之久？之毒？之狠？如今希特勒已被世人唾弃，德国人仍常常反省自己的历史。然而在中国，只要毛不倒，一些“造反派”和“官员”就各有一种道义上自慰的理由，而那种专制文化也得不到清算。这可算是“中国特色”了。历史有可能重演，中国的路还长得很。

甲：有人认为，“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于是就得出结论：“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

乙：我以为，这样讲有点含糊和笼统，似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用意和宗旨是好的，只是方式方法错了。这可能会被一些人钻了空子，因而值得商榷。如果笼统地说，“文革就是反官僚特权”（或说它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官僚特权正是人人痛恨的东西，尤其在今天——那就会导致基本肯定文革，并且把毛泽东划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一边，让人同情、怀念和拥护他。

甲：那么，文革失败的后果是什么？这后果又是由谁来承受呢？

乙：这后果仅是一些“造反派”因此受到了打击报复，没有能被提拔重用吗？没有能出国深造吗？是他们反倒是被判了刑、坐了牢吗？对个人来说，也许是如此，但从整体和大我来看，我们所有的人和整个社会，几十年来不都在承受着毛氏文革失败的“苦果”吗？

是的，且不说文革导致大量的家破人亡，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且不说它对国民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巨大破坏，且不说让教育和科技领域停滞断裂十年之久，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清廉的政府和光明安定的社会，相反，它的一个“丰功伟绩”便是把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最肮脏丑恶、愚昧腐朽的文化渣滓和社会上最卑劣无耻的人性全给翻腾上来，把各种污泥浊水全给搅成一片混汤，导致人们社会价值观的丧失和道德信仰的崩溃。正是“文化大革命”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让人彻底见识、效法各式各样的封建魔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今日中国的贪污腐败横行，人性堕落，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讽刺和惩罚。这是我们应当更多思考的地方，而不只是计较或抱怨个人的那点“荣辱得失”。

甲：你说得对。不过，文革并没有触动这官僚体制，反而“变本加厉”，滋生出更多的贪官污吏，看来是这体制本身需要整治和改造。

乙：的确，在这种体制之下，即使是文革中一些有名的“革命造反派”，一旦有权在手，不也很快就成为新“官僚”了吗？从刑讯罗征启的小头目起，到蒯大富、韩爱晶、聂元梓，到谢静宜、迟群、张铁生，到王秀珍、陈阿大、黄金海，到毛远新、刘湘屏、李再含，最后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一伙为“伟大领袖”所赏识的“革命造反派”，乘“直升机”而起，其所作所为算不算是滥用职权和令人更加憎恶的新“官僚”？

甲：我也奇怪，毛泽东怎么会看上 and 重用这么一帮家伙来治理国家！

乙：政治需要吧？“一朝天子一朝臣”嘛，被毛使用过的“伙计”们，文革中有上有下，如“走马灯”一般地更换，不过是京戏舞台上的“将出”和“相入”而已，那为什么有人要为



那些所谓“承受失败后果的（或说不被提拔重用的）造反派”伤感抱怨呢？若不从根本上改造这体制，那些“造反派”就不会成为新的“贪官污吏”啦？

甲：说到“造反派”，更早些时候的毛泽东本人，就是“造反”起家，是最大的“造反派”，结果又如何呢？成了独裁的君王。

乙：一点不错。由此我又想到黄炎培的“历史兴亡周期律”，即历史上王朝的更替频繁，“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毛泽东对黄说，他找到了打破这“周期律”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制。但他是在说空话，无意实行。他和邓小平，以及继任者们，在政治制度上仍坚持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若没有司法独立等“法制规范化”，没有舆论民主和新闻出版自由，又谈何打破这“兴亡周期律”？又谈何解决“官僚主义温床”的问题？

甲：从体制上讲，我国是一党专政的国家，在共产党内实行的又是“家长制”，“一言堂”，按邓小平的话，就是“威权政治”，就是“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们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其余的就是君臣的实体，猫鼠的关系。这算是说到了有“中国特色”的封建专制体制的核心。

乙：要破除这种封建专制体制，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是建立一个“法制和法权”的民主社会。要有舆论民主和新闻出版自由，要建立司法独立等“法制规范化”，因为再英明的领袖和政党，也需要有民主的监督，而绝对的权力肯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里没有任何侥幸和幻想的余地。

甲：时间不早了，总结一下我们前边所说的。总结我们前边所说的，看来，若把文革的起因归结为“官民矛盾”的紧张，这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形，而文革也不是个办法来解决“官僚主义温床”的问题。

乙：是啊，如果认为毛泽东是“用民众的力量来平衡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就是鼓励群众造官僚的反”，这就在某种程度上美化了毛，至少会误导今天的一些人在心理上的认同，甚至向往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甲：回到我们开头所说的问题，那么到底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呢？

乙：对于这个问题，已有许多分析和猜测。我认为，归根结底，毛是执意要走他的那条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要踢开一切拦阻他的“绊脚石”。

甲：你说的“绊脚石”指的是什么？

乙：在毛看来，这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所谓的“走资派”，就是一大批党政军干部，他们在思想上、组织上赞同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路线。第二，是党内外众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权威”，毛把他们看作为刘少奇体系的社会基础。这些人有文化、有教养，坚持“独立思考”，接受西方的人文思想和人道主义；他们认同和欣赏刘的方针和路线，一贯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

甲：噢！对了，我记得文革时，是这样谈论刘少奇的“走资派”路线：

刚建国时，刘少奇就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要先搞些“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

1956年“八大”时，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强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否认了毛一贯热衷的“阶级斗争”理论。

在1962年趁毛氏“三面红旗”大败之时，刘少奇又推出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农村经济政策，（“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这也就是土改以后，他主张在中国农村实施的经济纲领。刘实际上是主张实行“市场经济”，完全否定了毛的“人民公社”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路线。

乙：不仅如此。如果不健忘的话，当时国内还有一条所谓的“文艺黑线”，主张“批判现实主义”、主张“人性论”和写“中间人物”等“宽松自由的文艺政策”；有一条“经济黑线”主张“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和“利润挂帅”；哲学上搞的是“合二而一”；外交上搞“三和一少”；政治上要为“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平反翻案”，还要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连中共中央书记处搞的“二月提纲”也鼓吹“资产阶级”的口号：“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不受毛的批判。

按文革时对刘少奇的批判来看，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整套“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刘少奇麾下有一庞大的干部队伍和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分别掌控了“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组织部”、“外交部”，“中联部”，国务院及各部委，党校和社科院，报刊出版等舆论机构，以及北京市委等省市要害部门。1965年毛泽东要批《海瑞罢官》，在北京硬是推不动，他也只能到上海秘密地搞。总而言之，按毛的话来说，那时就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毛泽东真成了势单力薄的“孤家寡人”了。

甲：这样看来，这确实是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而不是像现在有人讲的，“刘少奇和毛泽东都一样，本质上没有差别”。这些问题，也远不是像拿掉彭德怀或“彭罗陆杨”那样，简单地开个中央全会就可以解决的。

乙：是啊，毛泽东自己知道他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有多深，知道刘对毛式“社会主义”的威胁有多大。他比你我更清楚这“本质的不同”，甚至提到了“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这样的高度，且不惜一切代价搞“文化大革命”来拿掉这些“走资派”。一些当年参加过“大批判”和“揪刘火线”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对刘少奇的“种种反毛罪行”了如指掌，我奇怪，现在他们怎么会把这些根本差别就这样轻松地“一笔勾销”了？

甲：那毛泽东是怎样搬掉这些“绊脚石”的呢？

乙：毛利用受蛊惑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一石二鸟，上打“司令部”，下扫“牛鬼蛇神”。借助他们狂热愚昧的文武暴力，毛泽东摧残了多少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消灭了多少有思想、有见识的头脑？这是我国文明和文化的极大损失。毛的“文革”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胜利”了，他成功地推迟了我国现代化、民主化进程很多年。可以说，没有“红卫兵”和“造反派”，毛是搞不了“文化大革命”的。所以，否定文革，必然要否定“红卫兵运动”。

甲：是啊，对大多数“红卫兵”和“造反派”来说，违反初衷，“助纣为虐”也是原所料想不到的事。这无疑是个历史的悲剧。

乙：“红卫兵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独特的现象。最近我写了一篇《清华文革反思》，专门谈了清华人在文革中干的三件事：赶走工作组、打倒刘少奇、和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终结了全国的武斗。这三件大事也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鼎盛和衰亡的三个阶段，它们都与毛泽东有密切的关系。欢迎讨论指教。

甲：“红卫兵”与毛泽东的关系及其教训，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课题。

乙：然而，不论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多么强，手段多么毒辣，他的文革注定是要失败的。原因不是别的，是这个运动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宗旨，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它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也违反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甲：这怎么讲？

乙：今天时间不够了，简单地说吧，中国不曾有过“资本主义”，“复辟”二字又从何谈起？毛式“社会主义”是对“共产主义”的粗俗理解，不到卅年的实践就使我国人文和经济都陷于僵死的绝境。文革之后，邓小平果断地逆转了毛式“社会主义”道路，开始补了“资本主义”这一课，给中国带来了生气。然而，继之而来的邓式“权贵资本主义”又是对“资本主义”原始和粗俗的理解，它纵容权贵们官商勾结，对国有企业、全民财产恣意盗窃，瓜分变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产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各种社会问题，并造成对自然资源盲目的掠夺和对自然环境的任意破坏。毛邓二者都没有放弃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故皆不可取。这才是“文革”悲剧的症结所在，也是我们今天应当关注的政治改革问题。

甲：你这样讲，是把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毛刘之争”提到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上来认识了。

乙：正是这样！现在我们都知悉，社会实践已证明，毛式“社会主义”行不通了，“资本主义”是一个人类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但是你知道吗，其实，马克思早就告诫过共产党：在那些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国度里，不能直接去搞什么“社会主义”，相反，要鼓励发展资本主义，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制度上全面地发展。也就是说，要搞自由主义，要搞代议制国家，要搞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以彻底破除封建的“专制和特权”。

甲：哦？想不到马克思还有这样的高见！难怪现在人们顶多是同情刘少奇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一提他是“走资派”，就嘴软三分，矮了一截。不少人在肯定刘的政治主张时，往往理不直、气不壮，好像说不过毛的那些“豪言壮语”；或者，干脆认为他反正和毛是一党的，都一样。

乙：如果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也是毛泽东的死敌，“走资派”在中国是合理的，进而，又认识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为什么中国必须要搞“政治改革”？那就可以在一个高层次上来倒毛，更深入地批判“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停留在仅仅对毛泽东和文革“血泪控诉”的水平。

甲：那太好了！希望下次对话时，我们可以再深入地探讨这些有趣的问题。

乙：好的！不过，要谈刘少奇和马克思，我们就要进入一个“雷区”了，会引起很多争议的。再见！

初稿于2014年3月，完稿于2014年7月

（邵济群，1943年生，清华工程物理系1967届毕业生。）

□ 来源：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研究报告】

上海红卫兵运动的异端中串会

• 李 逊 •

“中串会”全称“上海中学运动串联会”，形成于1967年7月左右，但他们最早的活动，可以上溯到1967年的2月左右。“中串会作为一个交换意见的串联会议，正式开始于2月”，〔1〕当时正是一月夺权不久，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经常互相串联，开会碰头讨论局势。

1967年3、4月左右，由市革会办公室、教卫组和政法指挥部领导，市公安局“反逆小组”具体指导，红西南、红东北、红中技、红上司、红三司、红反会等中学红卫兵组织联合筹办“联动罪行展览会”；这个展览7月12日在上海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开幕，展出时的正式名称是《上海市揭发批判刘、邓毒害青少年罪行展览会》。展览会的主要内容是批判联动。7月19日，市西中学、复兴中学、第五十四中学等学校，又在劳动剧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揭发批判刘邓毒害青少年大会”，批判“联动”。〔2〕

“联动”，即“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本是1967年初北京干部子女红卫兵组织的串联性组织，与造反派红卫兵对立。上海没有类似的全市性干部子女串联组织，但上海一些干部子女比较多的中学内，干部子女与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对立也十分严重。他们大多曾经是保市委的上红总部成员，上红总部垮台后，他们不愿加入造反派的红卫兵组织，自己另起炉灶，改换组织名称与造反派对立。这样的干部子女组织在许多学校都有。如南洋模范中学的“0827”，上海中学的“十红”，第五十四中学的“三红”，复旦附中的“铁血团”、市西中学的“红联站”，以及第五十一中学、师院附中、松江二中等学校的组织。这些组织，被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也称为联动，或者干脆叫“土联动”；成员被认为是血统论在上海的推动者。

筹办批判血统论的展览，将持反对血统论观点的中学生组织串联到一起了。徐汇区和卢湾区是干部子女较集中的区，1967年5月10日，这两个区和一些中学的红卫兵，在市二女中召开“打联动大会”，批判上红总部。会上由向明中学高三学生王毅捷宣读《通令》，会后游行。这些学校的红卫兵，不久与交大附中等学校观点相同的学生串联，于7月中旬又在市二女中开会，筹备成立全市性联络网，北京“四三派”也有人参加。但会议开到一半，来了个电话说交大附中学生与同济东方红打起来了，与会者立即中断会议去同济大学抗议，会议虽然没有结果，但持反“联动”相同观点的学校组织走到一起了。〔3〕

7月下旬，一些学校又在交大附中两次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学运动串联会”（简称“中串会”）；并决定演出大型歌舞剧，以扩大影响，即后来的《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7月底，上海一百多个中学在文化广场开会，批判上红总部执行的血统论，并宣布中串会已经成立。（4）中串会的主要骨干学校及骨干组织有：向明中学的“东方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市西中学的红上司、光明中学的红上司、徐汇中学的“新徐汇公社”、市二女中的“市二兵团”、上海中学的“红上中”和“28团”、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红革会、复兴中学红革会、比乐中学“28团”、第五十四中学的“新五十四公社”、南洋模范中学“东方红公社”，等等。（5）而且其中属于什么市级组织的成员都有：红革会、红西南、红东北、红反会，等等，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个跨组织的串联性组织。中串会的组织形式十分松散：没有固定办公地点，要开会时临时选个中学作会址；而且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负责人或领导班子，每区由一、二个学校负责联络，直到1968年1月27日，才在市西中学开会选举出王毅捷等七人，作为常设性的联络员。（6）

红上司是中串会中起作用较大的组织。红上司批判联动和血统论最坚决，而且手里有《红卫战报》，这是上海红卫兵组织尤其是中学红卫兵组织中，影响最大的报纸。1967年的《红卫战报》上，批判联动或血统论的文章有五六篇。

中串会活跃的学校大多是重点中学。这些学校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都是上海的中学运动积极分子。他们大多是普通市民家庭的子女，许多人文革初期被血统论排斥在红卫兵组织之外，甚至文革前就因阶级路线被长期压抑。文革激发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更激发了他们对政治等级身份的反抗意识。而反联动展览会以及中串会的形成，也使平民子女对干部子女的对立，有了集体意识和对抗意识。他们张贴批判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还组织人员袭击干部子女的组织。中串会当时曾经有一份声明，表达其宗旨：

中学运动串联会是我们中等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促进学校的大批判、大联合在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斗争的基础上，在与联动为代表的企图从根本上来否定一年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动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反动势力斗争的基础上，在与妄图从根本上来否定一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联动分子斗争的基础上，串联而成的。……

一年来中串会的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他们无愧是一小撮走资派、联动分子和牛鬼蛇神感到最害怕、最棘手和最恼火的革命势力。他们是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7）

干部子女的组织也不示弱，频频出手反击。于是在一些干部子女较多的学校，尤其在南洋模范中学、上海中学和第五十四中学，双方冲突不断，甚至发生多起武斗。1967年6月初，南洋模范中学一个华东局领导干部的儿子被打伤，引发第二天全市干部子女大游行。参加者上千人，都穿着褪色的军装，扎着腰带，许多男生还上身穿着蓝白横条海魂衫，下身穿着蓝色的空军裤；脚上穿着黑色灯芯绒面咖啡色塑料鞋底的“松紧鞋”，这是北京出产的，而不是上海出产的白色鞋底那种。当时，绿色的陆军军装已经大众化，几乎人人都穿，不再像红卫兵运动初期那样只是干部子女特有。为了存心区别于其他阶层的子女，上海的干部子女又流行起这样的服装，而且军装必须是褪色得发白的，而不是军绿的，连鞋子也存心与众不同。他们从淮海路出发，沿着衡山路游行。张春桥的女儿、复旦附中的学生张维维也参加了这次游行，但她穿得非常普通而且平民化，在一片褪色的军装中，只有她是白衬衫黑裤子。（8）这次游行被中串会认为是向他们乃至向文革的示威。

7月13日，《红卫战报》的红1号（总第42期）上，刊登《关于中学运动的七点声明》，由17个组织联合署名，这17个组织来自17所中学。这个声明，可以看作是中串会的正式公开宣言。文章认为，运动初期以血统论伤害了广大教师和同学的保守派组织，有

些又利用当前的大联合，已经混入或正在千方百计混入大联合机构，“打出造反旗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继续和革命派对抗”，而“目前有些学校搞合二而一，搞调和折衷，搞两全一散（全民选举、全民联合，解散一切左派组织），大权没有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中”，呼吁“革命造反派组织决不能和保守派组织平起平坐搞大合并。大联合就是要以革命造反派为核心，权就是要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中”。7月中旬，中串会与市六女中和控江中学等学校，在市党校为这七点声明进行过两次辩论。中串会方面的主辩者是上海中学的高三学生毛兵以及向明中学的高三学生王毅捷；对方的主辩者是控江中学的高二学生梅子涵。辩论的中心是“大联合”应该是怎样的联合。

中串会的串联活动正与市中学红代会的筹建同期，他们对正在筹备的市红代会非常不满，认为市红代会（筹）在各个中学推动的大联合，只是为联合而联合，却不去肃清中学红卫兵运动中的各种错误或反动思潮，尤其北京联动鼓吹得最起劲的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上海也有不小影响，必须着力批判：“反动血统论直接阻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直接抵制了我们铲除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斗争，直接破坏了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9〕中串会认为，许多中学之所以“联而不合”，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肃清血统论流毒，那些曾经以血统论伤害过同学的干部子女，对自己的过错既无认识，也无检讨，更无道歉；而且有些人现在又成为学校大联合后的负责人，让那些曾经被伤害的学生不能接受，不愿与他们联合。〔10〕中串会的这些观点，是广大市民阶层的子女，以批判血统论为楔入，对文革前便已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政治等级身份制的曲线批判。

中串会对市革会把市六女中和控江中学的大联合作为样板尤其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大联合强调“团结大多数”，是不分左派和右派，不分造反派和保守派，是“和稀泥”式的大联合，实际上是放弃以造反派为核心的右倾行为。尤其没有参加过任何重大事件的市六女中代表，却担任了市中学红代会（筹）主要召集人，造反最早的几个市级组织，地位反不如市六女中，这是排斥老造反。他们认为市六都是女生，女生比较听话，徐景贤等市革会领导，就喜欢这种听话类型的人；他们指责市六女中是“市革会的御用工具”，是“坐享文革其成”。〔11〕中串会认为自己是老造反，参与了从安亭事件到“一月夺权”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现在却遭到围攻：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我们为捍卫一月革命的成果，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和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联动”进行了持久的斗争；我们和极“左”思潮的代表——“联司”展开了艰苦的斗争；我们顶住了九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的极左思潮的攻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那些“策略派”却始终态度暧昧，甚至伙同保守势力来反对我们。……

我们始终不渝地认为，我们和所谓策略派的政治分歧，是要不要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问题，是要不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12〕

中串会所说的“策略派”，明显是指市中学红代会（筹）中的核心：市六女中以及控江中学的代表。因为他们都没有参加过上海的安亭、解放日报、康平路等重大事件。在另一篇文章中，中串会的这个抨击指向更加明确：

就在中学红代会已经召开几个星期后的今天，他们竟拒不承认已选出的九个常委，死抱住中学红代会筹备组不放，妄图在空间强行成立这样一个奇妙的恒等式：市六、控江某些人＝当然领导。……历史将嘲笑你们，市六、控江的某些人。〔13〕

其实，中串会的这些指责都是对着市革会的。一个当年的中串会成员回忆：

我们除了反对“血统论”，反对以市六、控江主持中学红代会的筹建，其实还有一个没有公开说出来的反对目标，就是张春桥。我们对市六、控江的不满，实际归根到底是对张春桥的。我们认为市六和控江都是张春桥控制的。张春桥位子坐稳了，就不要当初为他造反出力的人了，而是培植听他话的人。我们那时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实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变了，他要巩固文革秩序，我们已经不适合毛泽东的需要了。（14）

中串会的核心人物大多是中学生中的老造反，能言善辩会写，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都非常强，让市中学红代会（筹）头疼，觉得他们难弄。中串会还提出，市中学红代会筹建中也要有中串会的代表参加，遭市中学红代会（筹）拒绝，说他们是中央已经号召大联合之后再冒出来的组织，本身就违反了中央关于大联合的要求；而且他们不能算是一个市级组织，只是个松散的串联会。事实上，市中学红代会（筹）还有个没有说出的理由，就是觉得他们“专门搞对立，不是好组织”。（15）但是中串会坚持说自己是全市性的大组织，老造反，一定要作为一方组织参加红代会，炮司中学部在红代会（筹）的代表红鸥也一再帮中串会说话。12月下旬，张春桥表态，说就让中串会参加吧。（16）于是中串会在市红代会（筹）也有了席位。最初由已经担任向明中学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毅捷作为代表，因为大家认为他善于言辞，可以帮中串会说话。但王毅捷所在的红卫兵组织“反到底”中学部，认为他不是该组织负责人，说派往红代会者必须是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要求换人。于是换了“反到底”中学部的另一个负责人。

中串会的鼎盛时期不长。市中学红代会成立两个月以后，1968年2月，中串会因文章《一切为了九大》遭到批判。骨干成员全部被办学习班，中串会从此不复存在。

注释：

1. 《中学红卫兵》就目前形势答读者问，编辑部1967年10月30日。此文是朱维铮1967年10月左右给市革会的关于中串会的情况的附件。
2. 这个消息载于1967年4月27日第35期《红卫战报》，“红上司”主办。
3. 王毅捷1968年3月26日给“市革会教卫组、解放军同志和市红代会”的《请示报告》。
4. 同上。
5. 这些学校及组织的名单引自市六女中、控江中学、淮海中学、徐汇中学红卫兵团，以及交大附中东纵、交大附中井冈山、第五十四中学三红、延安中学井冈山1968年1月16日给上海市革会的《中串会言论集》。
6. 这七人是：向明中学王毅捷，交大附中金小蜂（原名徐增豪），第五十四中学燕飞，交大附中魏威（原名魏楚麟）、光明中学冯军（原名冯宝祥）、市西中学许宏纲、魏明。时间和名单均引自王毅捷1968年3月26日给市革会教卫组、解放军同志和市红代会的《请示报告》。王毅捷的这份《请示报告》中，说这七人是负责人，但据金小蜂和魏威文革后对笔者的回忆，说中串会没有产生过负责人，说应该只是联络员。
7. 《中学红卫兵》就目前形势答读者问，《中学红卫兵》编辑部1967年10月30日。此文是朱维铮1967年10月左右给市革会的关于中串会的情况的附件。
8. 笔者当年也随松江二中的同学参加了这个游行，看到张维维。不过她没有参加全程，而且不在她自己的学校队伍中，而是在松江二中的队伍中，走在笔者后面。
9. 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红缨枪”著《联动的要害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载于《红卫战报》1967年6月17日第41期，“红上司”主办。
10. 这个观点是当年中串会观点的徐汇中学高三学生文贯中在2009年9月24日在电话中对笔者谈起的。当年的中串会成员：复旦中学高一学生管宇春、复旦附中高一学生张水

荣、交大附中高三学生魏威在2009年11月25日笔者对他们的访谈中也谈到这个观点。当时的《红卫战报》上也有文章提及。

11. 笔者2009年11月25日对原中串会成员管宇春、张水荣、魏威的访谈。

12. 《给春桥同志的一封信》，载于照相影印版《红卫战报》，总第47期，1968年1月20日，上海中等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战报》编辑部主办，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3. 《你们想干什么》，载于照相影印版《红卫战报》，总第47期，1968年1月20日，上海中等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战报》编辑部主办，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文中的红代会常委人数与笔者前面的访谈有些不同。

14. 笔者2009年11月25日对原中串会成员管宇春、张水荣、魏威的访谈，这段话是魏威回忆的。

15. 这话是当年参加筹建中学红代会的军代表、“南京路上好八连”副连长苗生元在笔者2009年8月12日访谈他时说的。

16. 张春桥同意中串会参加中学红代会的筹备，是原南京路上好八连副连长、中学红代会的军代表苗生元2009年8月12日对笔者说的。此外，在王毅捷1968年3月26日给市革会教卫组、解放军同志和市红代会的《请示报告》中，也提到1967年“12月下旬，张春桥同志指示，让中串会进红代会”。

□ 摘自《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中的一节，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出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